

陈桂炳 著

泉州學概論



吉林大學出版社

泉州学概论

陈桂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学概论 / 陈桂炳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677-5013-5

I. ①泉… II. ①陈… III. ①泉州市—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0057号

书 名：泉州学概论
作 者：陈桂炳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朱进 曹德斌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2.875 字数：380千字
ISBN 978-7-5677-5013-5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5年12月 第1版
2015年12月 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序

地方学学科理论建设相对滞后,成为了我国地方学发展的一大瓶颈。据统计,全国各地地方学已有几十个,但到目前为止,有出版概论性专著者,却寥寥无几,能为学术界所认可的则更少,比如《徽州学概论》(姚邦藻主编)等。有的专著为慎重起见,书名不叫“概论”,而称“引论”。比如在去年刚出版的,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的《广州学引论》(邱昶、黄昕著)中,作者的看法是“意在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泉州学在全国地方学的研究中,起步较早,研究时间不短,研究成果不少。但遗憾的是,像《泉州学概论》这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专著,却迟迟未问世。1997年我到泉州师专任党委书记,后任泉州师范学院院长。我认为地方性高等院校必须以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为己任,为此十分注重学校泉州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建议时任泉州学研究所所长陈桂炳教授应当适时编写《泉州学概论》。时隔十多年,看到陈桂炳教授的《泉州学概论》,这一项填补空白的重要研究成果即将付梓,确实感到可喜可贺。

作为地方学概论性专著,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泉州学学科建立的理由进行充分阐述。作者在“引论”一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凭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东亚文化之都”(首届)、“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首个)这三顶国家级、东亚级、世界级的文化桂冠,泉州学的提出与建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天时”(史学观念变迁的学术背景)、“地利”(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人和”(前赴后继的泉州学研究先行者)三个方面,对“泉州学”学科的由来与发展进行了论述,十分有说服力;二是对泉州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作者认为:应以开放

的态度,鼓励各种有利于地方学学科建设及其发展的研究方法,使地方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不断的研究实践,得以总结、提升和完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于目前仍处于讨论和建设、独立学科地位尚未完全建立的地方学,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还认为:从地方学的学科角度考虑,一种具体的地方学是否有成立的价值,关键是要看其研究对象是否有自己的特色和意义,而这种特色是必须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凸显出来。“在地方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中,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这对地方学研究者是有启示作用的;三是突出了人的作用。本书第二章是“泉州人”。文化是人创造的,又可以“以文化人”,文化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种顺序安排充分表明作者“探讨泉州学的研究对象泉州地方文化,首先就对泉州人的讨论入手”的基本观点;四是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体会,对泉州学研究的相关领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对泉州民间信仰,作者认为研究民间信仰首先要厘清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关系、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作者认为“如果我们把民间信仰解释为‘准宗教’,与宗教搭上边,无疑可以姑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间信仰的法律地位问题,名正则言顺,否则,我们在进行民间信仰的具体研究中,必然会遇到不少的迷惑和困难。”这样的认识对深入研究民间信仰是十分有帮助的。再比如对泉州民间风俗,作者总结出传播性、区域性、变异性、兼容性四点作为主要特征,其中兼容性特征,凸显了泉州文化多元性的特质。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作者对欧阳詹、曾公亮、郑成功、施琅等人,均能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定位、深远影响等展开论述,尤其是评价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人物。比如对于洪承畴,作者用“在历史狭缝中前进的洪承畴”为标题,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握好评价的分寸。另外,在“泉州海外交通”一章中,作者特意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加以论述,反映了泉州学的研究对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陈桂炳教授30多年来,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他淡泊明志,甘于寂寞,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坚守自己的研

究领域，默默耕耘，成果累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泉州学概论》作为多学科的著作，由于囿于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陈桂炳教授能广泛地吸收、消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加以注明，体现了作者兼容并蓄和严谨治学的精神。

是为序。

陈笃彬

2015年9月2日

于泉州平水庙四读阁

（陈笃彬，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福建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泉州师专党委书记、泉州师范学院院长、福州大学党委书记。系第十届福建省政协常委，第十届、第十二届福建省人大代表，第六届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分会副会长，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出版论著14部，获得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现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学”与“泉州学”	1
一、“泉州学”之“学”	1
二、“泉州学”能成立	3
第二节 “泉州学”之由来	5
一、天时：史学观念变迁的学术背景	5
二、地利：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12
三、人和：前赴后继的泉州学研究先行者	19
四、“泉州学”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	44
第三节 关于泉州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48
一、泉州学的内涵与外延	48
二、泉州学与闽南文化的关系	52
三、泉州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55
第二章 泉州人	72
第一节 泉州人及其性格	72
一、泉州人的形成	73
二、泉州人的性格	79
第二节 泉州历史名人点评	83
一、“闽海贤才开气运”的欧阳詹	83
二、“可方汉张安世”的曾公亮	88
三、“开辟荆榛逐荷夷”的郑成功	94
四、具有地缘战略眼光的施琅	99
五、在历史狭缝中前进的洪承畴	105

泉州学概论

第三章 泉州海外交通	121
第一节 泉州港	121
一、三大湾十二支港	121
二、泉州港的地理优势	124
第二节 泉州海外贸易	127
一、泉州古代海外贸易的历史考察	128
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142
第三节 泉州海外移民	144
一、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移民	144
二、明清至民国时期泉州的海外移民	147
三、泉州海外移民的原因及其对移居地的贡献	149
第四章 泉州民间信仰与宗教	156
第一节 泉州民间信仰	156
一、“民间信仰”释义	156
二、泉州民间信仰主要神祇	163
三、民间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	178
第二节 泉州多元宗教	181
一、泉州历史上的多元宗教	181
二、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和谐共处的原因	200
第五章 泉州方言与泉腔戏曲	209
第一节 泉州方言	209
一、泉州方言的形成与流播	209
二、泉州方言的特点	215
三、泉州方言与地方文化	221
第二节 泉州南音与戏剧	228
一、泉州南音	228
二、泉州戏剧	249
第六章 泉州民间风俗	290
第一节 泉州民间风俗的范畴与特征	290

目 录

一、泉州学应重视对泉州民间风俗的研究·····	290
二、泉州民间风俗的时空范畴与主要特征·····	292
第二节 泉州民间风俗概说·····	304
一、泉州生活习俗·····	304
二、泉州岁时习俗·····	315
三、泉州礼仪习俗·····	326
四、泉州行业习俗·····	337
后 记·····	35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学”与“泉州学”

一、“泉州学”之“学”

《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论“泉州学”，应先从“学”之字义说起。

泉州乡贤李亦园教授是台湾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在其学术领域里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学术视野宽广。1999年，李亦园教授与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共同组织了首届“海峡两岸泉州学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作了《“泉州学”的新视野》的主题演讲。李亦园教授的《“泉州学”的新视野》就是从“学”之字义讲起：

“学”字在近世的用法大都来自西洋的-ology一字，根据Webster大字典的定义，-ology是指一个学科、一门科学或知识，所以说一般虽较多用于指某一特定学科，如生物学(Biology)、地质学(Geology)、社会学(Sociology)、人类学(Anthropology)或考古学(Archaeology)等等，但也可以用在指专门研究某一地方，或某一特定人物、事的知识与学问。在中文里“学”的意义就更广了。根据上海出版的《汉语大辞典》，“学”字除一般所指的学习外，可以指学科、学问、学说与学派等等(1997)。又台北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则说“学犹道也、术也；又近世凡研究某一事物自成系统，具有条贯者。皆谓之学”(1979)。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接尾词(suffix)的“学”，最少可以有两种用法，一种较常用的是指一门学科，另一种则可以用作专门研究某一特定人物、事物，或某一特定地方的学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孟子学’、“朱子学”、“退溪学”(韩国)、“徂徕学”(日本荻生徂徕)，以及“汉学”、“日本学”、“生死学”、“未来学”等等的用法，而用作“泉州学”、“潮州学”、“雷州学”、

“琼州学”等等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

李亦园教授引用了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大字典、大辞典,对“学”之字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认为在作为接尾词的“学”,主要有两种用法,“泉州学”应属第二种用法,是“可以用作专门研究某一特定人物、事物,或某一特定地方的学问”。本书采用这个看法,即“泉州学”是专门研究泉州这一“特定地方的学问”。

李亦园教授当年在主题演讲中提到的“‘泉州学’、‘潮州学’、‘雷州学’、‘琼州学’等等”,我们现在一般称为“地方学”。在国外,地方学被称为“地区学”(李教授在主题演讲中亦称“地区学”),它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奠基者是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其代表性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地区学》。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要“把地区(空间)作为一个固定的范围进行具体研究,以探索地区演变的过程,并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2]地区学兴起之后,国外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地区学专业和地区学研究所,并招收研究生,如韩国首尔大学即设立首尔学研究所。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地方学的研究亦悄然兴起:1985年,安徽省徽州学研究会、徽州地区徽州学会先后成立,其后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徽州学研究机构;1986年,上海大学召开了“上海学研讨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负责人在会上倡议要成立上海学学会;福建省泉州的文史工作者早在1980年就已开始在探讨“泉州学”这一新概念,并于1991年11月与1996年5月先后成立泉州市中国泉州学研究所和泉州师范专科学校(今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1991年8月,广东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潮州学研究的发轫,至1992年11月,举办首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正式树起“潮州学”大旗。进入21世纪后,地方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02年成立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于2005年联络温州学研究会、泉州学研究所、西口文化研究会、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扬州学研究会、三峡学研究会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地方学联席会。与北京学、徽学、晋学、三峡学、上海学等相呼应,使近十年地方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发展气势。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学在我国地方学的的研究中,无疑具有广泛的辐射和引领作用。2011年10月,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基地)、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联合大学人文地理学市级学术创新团队、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韩国和全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从研讨会的主题可以看出,当前的地方学研究,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由于作为接尾词的“学”,主要有两种用法,因此,作为地方学具体研究对象的各种“某某学”,或称是一门学科,或称是一种学问,而以前者为多。作为较为乐观的前瞻性思考,如果地方学今后能顺利地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或许有望可挂靠于某些二级学科下为三级学科。

二、“泉州学”能成立

当我们在回顾地方学发展的历史时,即可发现,不少地方学在其酝酿及兴起之初,都有遇到或多或少的质疑。

例如上海学。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1期发表的选自当年提交“上海学研讨会”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上海学”在起步之初,并不被一致看好。庄锡昌《上海学发展的三个决定因素》中提及:“据说围绕‘是否有可能开展上海学研究’、‘什么叫做上海学’、‘上海学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等等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就以上诸问题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上海学’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不仅有条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理由很简单:上海是一座具有其独特性的城市。上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某种独特之处,存在着许多有关上海的特殊学问,需要进行专门研究,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就有可能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上海学’。”王熙梅《从对象学看上海学》也说:“‘上海学’能成为一门学科吗?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也有的在能与不能之间徘徊、思索。可见,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顾晓鸣《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虽对该问题持谨慎态度,但看法仍是肯定的:

“严格地说,‘上海学’是不能称学的,只能是一种研究领域,因为所谓‘XX学’应该具有区别其他学科的特有的理论方法论,例如各种特定的概念和方法。但是从现实的社会研究来看,以国家和地区综合研究为中心的‘XX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两方面都有这种必要性:一方面,为了使研究对象集中,调动所有有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对XX学的确立是极有推进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学方法论所揭示的,任何一门学科抽象的概念和方法之产生和演进,只有在具体事实的研究过程中才

有可能,而具体事实必然是一种综合的历史沉积,譬如说‘城市学’,离开了全世界屈指可数的若干由历史积聚下来的大城市的具体事实,是不存在的。因此,反过来,要真正推进各种基础学科,如历史学、城市学、社会学等等,就一定要围绕这类历史凝聚起来的综合研究对象,建立相对集中的‘XX学’。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原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产生新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学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胡道静《祝愿上海学兴旺发达》指出:“‘上海’在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上是一个地理名词。上海之能被提到‘上海学’的地位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完全是由于它的天赋地形优势和人力勤奋经营造成的重要地位的现实所决定的。不是谁想给一个地方加冕为‘XX学’就行的。新学科或分支学科的产生,是根据学术发展的趋势、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以及需要程度而达成的。这里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不存在什么论资排辈。小到一个县名,只要它那里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成为‘学’、出现‘学’的。”这似乎是在从另一个侧面回应质疑者的看法。^[3]

泉州学也不例外。1980年,泉州的文史工作者刚开始探讨“泉州学”这一新概念时,也有人持保留态度引起争议。直到前几年本省内的一些学术活动中,还有个别对泉州学持否定意见的省内学者与笔者在探讨这个问题。因此,李亦园教授在1999年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泉州学学术研讨会”上所作主题演讲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泉州学能成立吗”,他在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旗帜鲜明地说:“10年前我第一次返回家乡时,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中就有人问我:‘研究泉州可以称为泉州学吗?’我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今天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还是肯定的。”^[4]其实,对照前引1986年“上海学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关于地方学的观点,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答案。如庄锡昌先生说:“理由很简单:上海是一座具有其独特性的城市。上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某种独特之处,存在着许多有关上海的特殊学问,需要进行专门研究,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就有可能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上海学’。”同样,泉州也是“一座具有其独特性的城市”。1982年2月1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历史文化名城24个。在该批历史文化名城中,福建省只有一个,就是泉州,属于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存在着许多特殊学问,需要进行专门研究,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泉州的昨天曾为世界的目光所关注,泉州的今天因其辉煌的经济成就而为全国所瞩目,泉

州的明天是美好的,“都有其某种独特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成立的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就在泉州,当年专程来泉州参加奠基仪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年项目主管拉姆兹女士说:“‘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指路灯。”笔者以为,单单凭着这一点,“泉州学”成立的理由就够充分了,或许可在这里套用前引庄锡昌先生的话说,“理由很简单”。2013年8月,泉州又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再一次证明了泉州历史文化的价值。

第二节 “泉州学”之由来

一、天时:史学观念变迁的学术背景

我们在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泉州学之由来时发现:自1926年“泉州学”学术意识的产生,至1980年“泉州学”名称的正式提出,以及1991年以后“泉州学”研究的崛起,^[5]无不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其所带来的史学观念变迁息息相关,且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偶然的发现,其实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使我们对泉州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坚定了我们构建与研究泉州学的信心。

1. 社会转型与史学转型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即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这一发展趋势,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年就敏锐地洞察到了,他说: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上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6]

为实现学问由旧向新之“过渡”,梁启超提出了“史学革命”和“新史学”^[7]口号,要改造中国之旧史,建立新史学。经过两千余年发展且积累有丰富成果的我国传统史学(即相对于“新史学”的旧史学),之所以在近代会面临着一场革命危机,是因为这传统史学深植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很突出的为历代封建统治服务的特点,与为历代皇权统治服务的传统政治文化相一致。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挽救国家危亡曾与挽救清王朝相一致,但当清王朝统治者不能担负起御侮大任又拒绝改革,特别是革命和民主启蒙的并起,封建皇朝的统治权威渐被削弱,代之以新的共和政体时,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文化所保持的协调关系即不复存在。就传统史学本身而言,因其服务对象是统治阶级,史学内容侧重政治,缺乏对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记载,很难为近代中国的国民所用。显然,跨入近代的我国传统史学如不进行“革命”,必将面临逐渐失去存在的危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构成了史学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史学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动力。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进步,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史学经历了由适应近代社会需要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由此看来,是社会转型促成了史学转型,而史学转型则体现了一种社会意识,或学术文化的变革。^[8]

梁启超是在世界史学史上首先提出“新史学”概念的我国著名学者,其代表性名作《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比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的发表早10年(鲁滨逊以《新史学》一书奠定了他在欧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9]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史学思想有:批判旧史和旧政治;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而且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今后的史书要写国民的事迹;主张历史学应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尽管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后来因落伍于时代而被更新形态与样式所代替,但不可否认,梁启超的“新史学”史学思想,对20世纪以来的史学界,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百余年前梁启超强调史学要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正好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方学是一种科际综合学问的学科定位相吻合。在梁启超强调史学要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及新史学要为国民而作等主张的影响下,史学界许多人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10]尽管当时他们在何为历史叙述主体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史学重在民史的学术观念和学人引进西方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

术实践,促成了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学人在治学思路眼光向下的历史性转变,地方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以及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为包括泉州学在内的各种以地方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学学科意识的浮现及后来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学术气候和土壤。

治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者把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新史学阶段,形成了早期新史学理论;第二个阶段是20至30年代中国新史学发展阶段,史学理论迅猛发展;第三个阶段是40年代,各种史观纷纷呈现,史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11]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那时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范围已经大大扩展,“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但是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并一直延续至今。^[12]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前述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而泉州学学科意识浮现的1926年,也正好处于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加以指出的。

史学转型及其史学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在史学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体现。把泉州学置于中国史学史的宏观学术背景下加以考虑,无疑是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泉州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及其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

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期史学观念的变迁,是孕育泉州学学科意识的宏观学术背景,那么,在此学术背景下成立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及其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则直接促使泉州学学科意识的浮现。

在中国各种学术思潮激荡澎湃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与“科学”的争论非常激烈,而那时正是中国史学史上各种史学理论迅猛发展的阶段,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因此,“史学”与“国学”存在诸多掺杂不清的关系。于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即站出来,对“史学”与“国学”的关系进行解释。如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国学”,即“国学”就是“史学”^[13]。顾颉刚也说:“国学是什么?是

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材料”^[14]。故当代的学者在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大学的史学活动时指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15]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能得以成立，关键是厦门大学的创办者陈嘉庚先生的办学宗旨及校长林文庆的办学理念。林文庆校长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说：

鄙人十余年前，因北京政府召集医学会议，曾在北京一次。在会议席上，一般人对于医学名称多用洋文，将来中国固有名辞，完全废弃，不仅生无限感概。因念中国数千年来固有文字，竟衰替以至于此，真足令人痛心切齿。未几适陈嘉庚先生请鄙人来长本校，鄙人即询其将来对于本校之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陈先生即答以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故鄙人来校之后，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聘请国内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16]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底开始筹备，1926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这是继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1929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等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国学专门研究机构。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亲任院长，语言文学家林语堂任总秘书，语言学家沈兼士任研究主任，鲁迅、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陈万里以及德国汉学家艾铎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中外著名学者都聚集该研究院，由于研究院的学术骨干大多来自北京大学，故当时媒体称其“大有北大南移之势”。^[17]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后，研究工作随即展开，丰富多采的泉州历史文化成为该院的研究热点，邻近厦门的泉州，自然成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人访古考察和民俗调查的首选地点。闽台历史文化研究专家汪毅夫教授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泉州历史文化研究》^[18]和洪峻峰先生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泉州访古与研究》^[19]等文，为我们了解80多年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人对泉州的访古调查及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得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学人对泉州的访古调查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同行者有张星烺、陈万里、艾铎风等3位先生，他们这次在泉州的实